

ZHONGGUO LUNLI SIXIANG SHI

沈善洪 王凤贤 著

中国 伦理 思想史

人
民
出
版
社



ZHONGGUO LUNLI SIXIANG SHI

沈善洪 王凤贤 著

中国伦理思想史

下

人
民
出
版
社

目录

第四十三章 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的社会状况和	
伦理思想	1
第一节 社会冲突和变化	1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变迁	8
第三节 伦理思想的创新	16
第四十四章 李贽反传统的道德观	22
第一节 思想和品格	22
第二节 童心说与私心说	28
第三节 个性说和平等说	37
第四十五章 顾宪成、高攀龙“志在世道”的	
伦理学说	48
第一节 生平及学派特色	48
第二节 性善说	57
第三节 修养论	66
第四十六章 刘宗周的诚意观和慎独说	74
第一节 生平事迹与为学宗旨	74
第二节 以“气质”为本的人性观	78
第三节 以“意”为本的诚意观	84

第四节	以“独”为体的慎独说	90
第四十七章	黄宗羲、陈确的伦理思想	98
第一节	生平事迹与学术宗旨	98
第二节	黄宗羲的心性论和道德观	104
第三节	陈确的人性论和理欲观	113
第四十八章	顾炎武的道德观和风俗论	121
第一节	生平事迹和学术渊源	121
第二节	“合私成公”的人性论	126
第三节	“行己有耻”的道德观	130
第四节	“拨乱反正”的风俗论	135
第四十九章	王夫之的理欲论和道德观	140
第一节	生平事迹和学术地位	140
第二节	“继善成性”论和“理欲统一”说	146
第三节	“公天下”的道德观和“任天下”的 人生观	156
第五十章	唐甄的道德观和功利论	164
第一节	唐甄和他的《潜书》	164
第二节	“五伦平恕”的道德观	167
第三节	“志任天下”的功利论	176
第五十一章	颜元、李塉的人性论和功利论	184
第一节	颜元、李塉及其学派	184
第二节	“气质为善”的人性论	188
第三节	“义利合一”的功利论和“利济苍生”的 人生观	195
第四节	“主动力行”的修养论	200
第五十二章	戴震的人性论和理欲观	205
第一节	生平事迹和为学风格	205

第二节	以“血气心知”为实体的人性论	209
第三节	以“达情遂欲”为准则的理欲观	214
第四节	以“人伦日用”为内容的道德观	220
第五十三章	近代中国社会和伦理观念的变革	225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	225
第二节	近代伦理思想的演变	234
第三节	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241
第五十四章	龚自珍、魏源的伦理思想	249
第一节	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倾向	249
第二节	人性论和个性解放思想	253
第三节	廉耻说和义利观	262
第五十五章	洪秀全、洪仁玕的宗教伦理思想	268
第一节	洪秀全、洪仁玕和太平天国	268
第二节	洪秀全的基本伦理观念	274
第三节	洪仁玕的伦理思想	281
第四节	宗教伦理和封建伦理的消极作用	287
第五十六章	曾国藩扶持纲常名教的实质	295
第一节	政治态度和学说倾向	295
第二节	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忠君思想	299
第三节	卖国主义的伦理观念	307
第四节	封建主义的治家伦理	310
第五十七章	康有为的伦理观念和大同理想	315
第一节	生平事迹和政治态度	315
第二节	“性无善恶”的自然人性论	322
第三节	“以仁为主”的博爱说	330
第四节	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	337
第五十八章	谭嗣同以《仁学》为主的伦理思想	348

第一节	生平事迹和学说渊源	348
第二节	冲决封建纲常名教的网罗	353
第三节	阐发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	360
第五十九章	严复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伦理思想	371
第一节	严复与严译名著	371
第二节	以“开民智”为前提的“新民德”思想	377
第三节	以感觉论为基础的善恶观念	384
第四节	以功利论为内容的道德观	389
第六十章	梁启超和他的《新民说》	396
第一节	生平事迹	396
第二节	“利群”、“爱国”的道德标准	402
第三节	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	418
第六十一章	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翼教丛编》	424
第一节	《翼教丛编》的由来和实质	424
第二节	形而上学的“纲常千古不易”论	428
第三节	禁欲主义的道德修养论	433
第六十二章	章太炎的道德观念和处世哲学	438
第一节	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438
第二节	救亡图存的“革命道德”论	445
第三节	虚无主义的“五无”、“四惑”论	452
第四节	善恶并进的“俱分进化”论	457
第六十三章	孙中山的伦理学说和大同理想	464
第一节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一生	464
第二节	物质文明与道德文明	472
第三节	博爱观与互助论	480
第四节	平等观与自由观	485
第五节	大同理想与有志竟成	492

第六十四章 蔡元培的德育论和人生观	498
第一节 生平事迹	498
第二节 以“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思想	502
第三节 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 德育大纲	508
第四节 以“合群利群”为已任的人生观	514
第六十五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道德 的冲击	520
第一节 尊孔复古逆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520
第二节 提倡“道德革命”和“伦理觉悟”	527
第三节 揭露封建伦常和专制制度的依存关系	538
第四节 批评“纲常不易”论和阐述“道德变迁”说	542
后 记	548

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的 社会状况和伦理思想

第一节 社会冲突和变化

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是指明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20 年）至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时期。

明万历之后，各种社会矛盾都急剧激化起来。一是以东南沿海地带为中心出现的大量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与当时的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矛盾日益激烈。二是土地兼并、租税的加重，深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三是东北地区的满族迅速崛起，构成了对业已腐朽的明王朝的巨大威胁。在各种剧烈的社会冲突中，公元 1644 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政权。然而大顺立足未稳，清兵旋即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消灭了明亡后南方建立起来的几个南明小朝廷，统一了全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

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在明初已经产生。根据元末明初《织工对》一书的作者徐一夔的描写，当时杭州已出现了雇有十几个工人的丝织作坊。作坊工作条件很差，“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作坊主与工人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工人“日佣为钱二百缗”，而且“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后一句话表明，当时类似的作坊还不少，已出现近似平均工资值的状况。同时，工人可以自由选择雇主。技术高的工人可以要求高过他人一倍的工资，雇主若不同意可另找新的雇主。这种雇佣关系显然已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在这种关系下的手工业工人，虽然劳动条件很差，“食无甘美”，但比起在封建关系下由主人任意处置那种境况，则要好得多了。

从现存资料看，资本主义萌芽在明初还只限于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及成化至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的各业中都开始有所发展，至万历年间，则已在各业中大量出现，并对社会经济、社会思潮及风俗习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在东南一带的丝织业、棉纺织业、陶瓷业、采矿业、造船业等手工行业中，都出现了大批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作坊。它们的产品通过市场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使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也活跃了起来。在一些沿海、沿江及位居内地水陆交通要道的城市中，手工业、商业极其繁荣。如东南名城杭州和苏州就是这样。据《万历杭州府志》记载：杭州在“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今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其原因是周围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之成为“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凑会”的大工商城市。苏州的情况也是这样。据万历二十九年曹

时聘的奏疏所录，万历时的苏州，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已成为从事生产、赖以生活的主要处所。当时苏州非常繁荣：“列巷通衢，华区绵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确为“货财所居，珍异所聚”。由于商业发展，苏州市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市场，如“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簪，云委山积”，从“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均见《苏州府志》）。可见市场之大。除杭州、苏州外，广州、成都、福州、南昌、嘉兴、松江等城市，也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如松江发展成为棉纺业中心，“线绫、三梭布二物衣被天下”（《松江府志》）。广州则以造船业为主，如此等等，各有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东南沿海一带还新兴许多经营手工业、商业的大市镇。如吴江县的震泽镇，元代只是个仅有数十家居民的小村落，明成化时增至三四百家，嘉靖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到明末清初已发展成一个拥有居民二三千家的丝织专业集镇（均见《震泽县志》）。此外，湖州的菱湖镇、嘉兴的梅里镇、江西铅山的河口镇等，都是从明中叶兴起，续而发展为千人以上的工商集镇的。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相联系，明中叶后，江南农村中也开始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剥削现象。个别手工业集中地区，还出现了农业为市场生产的新情况。这些状况，无疑将会触动和破坏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在清取代明的过程中，由于战乱，使东南的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至康熙之后开始复苏。如雍正时的苏州，几乎已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南北商贩青蓝布匹，俱于苏郡染造，踹坊多至四百余处，踹匠不下万人。”（《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三《职役三》）这里说的仅是苏州从事印染的踹坊，若以整个纺织业而论，工人数量还要大此几倍。苏州如此，江南其他地区也类似。

上述情况表明，从明代中叶到清初，在我国东南半壁，资本主义萌芽已不是个别现象，而已成为对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社会势力。这一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时伦理思想的发展变化。

错综复杂的政局

这一时期的政局极其复杂，变化也很多。概言之，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万历年间，特别是公元 1582 年张居正死后，明初朱元璋制定的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种种措施，都已走向反面。首先，本意为了强化皇权而把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的做法，自“土木之变”后开始失效，至万历年间皇权已名存而实亡。崇祯时虽欲振兴皇权，但其朝令夕改、刚愎自用的做法，却反而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集大权于皇帝一身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把皇帝与群臣对立了起来，所以并不有利于地主阶级集中整个阶级意志实现其统治；从实践过程来说，除了开国之君和少数几个皇帝外，一般在深宫中长大的君主，都是无知无能之辈。这些君主无心也无力决策大事，从而往往导致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本来，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之祸，严禁宦官干政，然而结果明代宦官专权，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明中后期，宦官们不但把持朝政，而且直接干预军事、刑狱、财税等国家大事。这些宦官纠集一些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飞扬跋扈，营私舞弊，不但大大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同时也打乱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其次，明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而采取了科举取士的办法。虽然这一办法确实曾使一些清寒之士走上仕途，但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只是程朱一派所注的“四书”、“五经”，因此，那些中试的知识分子，往往并无实际的治世本领。历年科举的结

果，只是形成了一个大而无用的官僚集团。这一集团中的少部分人，能够恪守封建道德，对同僚以至皇帝背离封建道德的行径，亦敢于提出规谏，但对于治世之道，往往显得迂阔无能。其中当然也出过一些有识之士，但除张居正外，几乎都未得到重用。该集团中的大多数，则登上仕途就以官谋私，并多半与宦官、权贵勾结起来，破坏法制，鱼肉百姓，成为明中叶之后的一大祸害。总之，至此，我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到宦官都已腐朽至极，已不能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

第二，统治集团的腐朽，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起来。明朝的发展很不平衡：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已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中原广大地区，还维持着传统的封建经济；在东北，由于明统治力量原来就较薄弱，加上满族力量的发展，到万历时已成为“边患”。这三种不同的情况，与明王朝构成了相互关联的三组矛盾。就对付满族来说，明王朝不但耗费了大量的军费，而且由于朝廷昏庸和群小当权，使许多能攻善守的良将被杀、被撤换，改由宦官及一些奸佞之徒掌握军权。所以，自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战役败于努尔哈赤之后，明朝一直处于节节退守之中，直到后来八旗军直驱入关。对东北用兵的开支，朝廷以田赋的形式转嫁到农民头上，称之为“辽饷”，后来又增加了“剿饷”、“练饷”。沉重的赋税，加上当时又连年发生天灾，把百姓推上了绝路。灾情最重的陕北，农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了。公元1627年，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在作战过程中虽然屡遭挫折，但由于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终于推翻了明王朝。在“西北干戈”的同时，产生了“东南坛站”，即东林党及其继承者复社的清议。东林党由一些关心国家大事的正派的士大夫组成，他们以封建道德为准则来评议朝政，揭露朝廷的种种背离封建道德规范的弊端，因此每每与朝廷的观

点截然相反。“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于是，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应该说，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新事物。东林、复社都出现在东南沿海，他们与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商业者有着广泛的联系，事实上已成为后者政治上的代表。如《明实录·神宗实录》所说：“东林之渐炽也，……富商大贾之类，如病如狂，走具供奉者，不知其数。”天启年间，当阉党搜捕东林党人时，苏州、扬州等地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组织民众围困了官署，打伤了前来搜捕的阉党爪牙，以示抗议。为什么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商业者会把捍卫封建道德的东林党人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呢？万历前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所以得到较大的发展，除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要求之外，主要原因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明王朝表面上集中统一，实际上已无力顾及各地的情形了。于是，在商品经济原来比较发展、交通比较发达的东南，资本主义因素就在手工业、商业中发展起来。但是，统治者的腐朽，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明代，各地广设关卡，阻碍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国家没有对工商税收统一的立法，朝廷及地方可以任意征税。至万历前后，明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税收、关卡等与工商业有关部门，绝大部分为贪赃枉法之徒所把持。他们不顾“祖宗成宪”，抛弃封建道德，横征暴敛，掠夺工商业者。而掠夺所得绝大部分落入其个人的私囊。所以，当时的工商业者，不仅苦于封建政权的压制，还苦于封建政权的腐朽，使贪官污吏得以恣意掠夺；不仅苦于封建道德的束缚，还苦于贪赃枉法之徒不顾封建道德的恣意妄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同情与希望寄托在维护封建道德，敢于与以权谋利的无耻官僚作斗争的东林党人身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东林党人，按其性质来说，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他们只是在反对当权者

的寡廉鲜耻这一点上代表了工商业者的利益而已。至于在当时及明清之际具有启蒙主义因素的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不过，他们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影响不如东林党那样深广，与工商业者的直接联系也不如东林党那样密切。

第三，清兵入关之后，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镇压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运动，对农民实行反攻倒算。顺治在迁都北京的第二年，就下令农民把在起义中夺得的土地“一一归还本主”，从而重新规定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满族在入关前，经济文化的发展较落后。这导致了其统治者在征战过程中实行的野蛮政策。他们在进入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江南地区时，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人间惨剧，使人民惨遭苦难，使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清王朝颁布的剃发令以及留辫子、改穿清朝衣冠等奴化政策，更是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强烈不满，遭到了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激烈抵抗，同时也激起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这种思潮虽然往往以“复明”为口号，其实际内容则是维护民族尊严，反对民族压迫与奴役，捍卫民族传统文化，因此是正义的、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潮在江南的士大夫中尤为激烈。后来到康熙时，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对具有民族意识的士大夫实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又采取了有利于民族和解的汉化政策，加上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固，生产也开始复苏，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才开始缓和下来。

总而言之，从明代中期到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明万历年间，统治阶级已经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与此相应，还出现了东林党及其后继者组成的“清议”中心，成为地主阶级在野的反对派。中原地区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农民大起义迅猛发展，但起义的结果是与明王朝两败俱伤，

使处于较低的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但却充满活力的满族趁机入关，建立了清王朝，统一了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无疑只能用恶的形式来实现。这种统一的过程，使东南沿海一带经济文化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受到了重大的挫折，但同时又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圈的扩大。这种“天崩地解”的形势，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从而产生了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伦理思想也开创了伦理学说史的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变迁

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变化很大，也很迅速。按其内容来说，一方面属于对程朱学派和阳明学派的批判和总结；另一方面则属于适应时代要求的创新。按其发展阶段来说，明代中叶至明末可说是发展与分化时期；明清之际则是总结与创新时期；清代前期则为续成时期。

发展与分化时期

自阳明学兴起到万历年间，可以说是王学风靡海内、顺利发展的时期。王学各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畿和王艮两派。活跃在万历年间的李贽，继承和发展了二王“现成良知”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反对封建道德的具有鲜明启蒙主义色彩的学说。李贽以提倡“童心”的纯真来反对理学的虚伪，并对“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①的伪道学，进行了尽情的揭露。他还提出了“私者，人之心”的命题和“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的说法。同时，李贽明确否定以孔子的是非为是

^① 由于后面各章有详说，此处与下引均不注出处。

非，主张要以吾心良知所判定的是非为是非，否定圣人与凡人在人品上的差别，主张“人本自治”，人应不受约束率性而行。李贽这种反对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学说，像狂飙一样，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据说他每到之处从者如云，他的演讲能使“一境如狂”。公元1602年，他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而遭迫害致死。去世后，他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应该看到，李贽的学说有它的两面性。除了上述占主导地位的积极的一面以外，他在否定封建道德的同时否定了一切道德规范；在反对理学禁欲主义时，全面肯定了利己主义，否定了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他的思想既为要求摆脱封建羁绊者所喜，也能为不讲道德廉耻者所用。而当时正值群小猖狂，乱世害民之际。阳明学与李贽的这些观点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于是有东林学派出。东林巨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早年都受过王学洗礼。鉴于现成良知派及李贽学说的消极作用，起而批评作为王畿、李贽等人的学说之基础的王学“四句教”。他们揭露了“四句教”本身的矛盾，如从性善论出发，批评了“无善无恶”说；从格物说出发，批评了“现成良知”说及“顿悟”说。他们还着重揭露了这一学说“埋藏君子，出脱小人”的有害的社会作用。但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批评“四句教”及阳明后学时，在理论方面并无创新，只是搬用程朱理学为理论武器。他们自称学宗程朱，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的理论却是杂糅王学与朱学而成的。东林学派的学术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所以，虽说他们在理论上建树不多，但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力反小人乱政，因此博得了很大的名声，并使他们的学说也具有了广泛的影响。

东林学派仅仅批评了“四句教”及阳明后学，对整个宋明理学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与总结。这一工作是由万历后期至明末的刘宗周开始的。刘宗周是个“上承濂洛，下贯朱王”的严

肃学者。他早年接受过湛若水一派的影响，继而攻程朱之学，最后转入王学。与王畿等人的现成良知派不同，刘宗周属王学中的功夫派。不论对于朱学或王学，刘宗周都并不一味信从，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都在分析批判朱、王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刘宗周既不同意“理”也不同意“心”为宇宙本体，而是继承张载的观点，以“气”为宇宙本体。虽然这种宇宙观与他自创的“诚意”、“慎独”等说法，在理论上未能达到协调一致，但他在恢复和发扬“气一元论”这一唯物主义宇宙观方面的作用，是不应抹杀的。对于宋儒精心构制的“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他在认真分析之后都加以否定了，从而给自然人性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于王门“四句教”，他比东林学派更加深入地进行了批判。刘宗周继承了王门弟子钱宽等人所传的“功夫派”，在道德修养方面阐发了具有独创性的“诚意”说与“慎独”说。虽然他把“意”与“独”夸大到具有本位意义的说法，不免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其中关于修养内容及方法的不少见解，确实给道德修养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从李贽对封建道德的直接冲击，到东林学派对个人的社会责任及品德气节的重新强调，在这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朱学与王学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引起了刘宗周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反思，促使了思想界从宋明理学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启了明清之际学术繁荣的局面。

总结与创新时期

明清之际是我国先秦之后的又一个学术繁荣时期。除了著名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外，还有傅山、李颀、方以智、陈确、唐甄等一大批思想家。促成这种学术繁荣局面形成的，主要